

1959年张闻天被批“反总理”。他的秘书何方在其出版的《何方谈史忆人》一书中，回忆了这一事件的内情。

张闻天看不惯周恩来外事接待讲排场



两人一直互相尊重互相照顾

周恩来和张闻天都是见过大世面、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观念的人，外交思想比较接近是很自然的。再加上不知是否出于历史的原因（两人同为延安整风中挨批的主要对象），他们一直都是互相尊重和互相照顾的。

据胡乔木在纪念张闻天的文章中说，1958年中央决定陈毅接任周恩来兼任的外交部长时，曾考虑是不是把张闻天给调开，但周恩来主张把他留下来，说他在外交部搞得不错，工作仔细认真。在平时工作中，周恩来比较尊重张闻天的意见。还有个令我一直在记挂在心的事，就是1959年庐山会议后没有见到周恩来对张闻天的批判。开了差不多一个月批张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他只到会讲了一次国际形势和阶级斗争等问题，批判了彭德怀，也没特别批张闻天。

而张闻天不但赞同周恩来的不少外交思想，而且也很佩服他“不知疲

倦的工作精神”。由于一些思想相通，所以周恩来受到批评时，张闻天往往表示同情，有时两人还站在一起。例如1954年日内瓦会议后，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没有及时突出台湾问题，张闻天就曾私下表示不以为然。

也有矛盾和彼此看不惯的地方

当然也不必隐讳，周恩来和张闻天两个人之间还是有些矛盾和相互看不惯的地方。例如张闻天就一直认为总理有事务主义的毛病，事情管得太具体，对下面不放手。特别是他认为，总理对形势政策研究不够，也不太重视基本业务如规章制度等的建设；可以花很长时间接见个别记者或中外人士，却没时间及时审批一些重要文件如年度总结和规划等；有时参加使节会议或外事会议的代表等候总理接见，得等上一两个月，一次等了两个多月，最后宣布总理没时间，不见了，让大家回去。张闻天对这些都很有意见。

张闻天很重视每年的年终报告，每年12月呈递上去后老是要我催总理快批。总理办公室外事秘书总是说，总理桌案上等着批的文件有一摞，他们把闻天同志送的报告拿出来放在最上面，总理一看，说不急，就又放到下面去了。所以每年都是过一两个月才批发。1958年外交部务虚会上，在陈毅要求给总理提意见的号召下，张闻天还以此为例提意见，这也成了1959年批斗他时给他安的一条“反总理”的罪状。

但是反过来，周总理却认为张闻天有点偏重研究和务虚，对具体工作抓得不够，特别是对交际工作没兴趣，会见外宾不积极。这最后一点也是张闻天自

己在会上挑明并且做了自我批评的。

批接待铺张惹总理大发脾气

对外宾接待，建国后特别重视一定要搞得场面宏大，招待丰盛。周总理和陈老总又喜欢讲排场、图好看，弄得接待外宾的工作，不仅是外交部，一些地方和部门也感到不胜负担。对这些，几位副部长和礼宾司部分同志都有意见。尤其是张闻天，他认为在外宾接待上规格太高，造成过分的铺张浪费，也违背国际惯例（如群众夹道欢迎、请客送礼太滥太丰盛等），并且公开批评，说这和援助外国、支持世界革命不自量力一样，都是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一再提倡进行礼宾改革。

也许是乘国内反冒进之风，1957年，主管礼宾司的姬鹏飞副部长领人去了一些省市视察外事处工作，回来就让秘书写了一份反映接待外宾铺张浪费的材料，发表在了新华社《内部参考》。无独有偶，正是此时，张闻天原先布置礼宾司起草的礼宾改革方案，在征求各方意见后已形成正式文件。周总理访问亚欧11国回国后，当着外交部领导的面（张闻天没参加）发了一通脾气，说以后请客没钱了就用我的工资。张闻天和外交部酝酿好久的礼宾改革，从此也就束之高阁。这是张闻天在1959年外事会议上挨批斗时的一条重要罪状——“反总理”。

实际上，据我观察，无论张闻天还是周总理，后来好像都没把这当成一回事。他们的关系依然不错，所以才有一年后陈毅接任外交部长时，正是周恩来主张让张闻天继续留任的事。

（据《何方谈史忆人》）

周恩来为什么不忘日俄战争

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日俄战争110周年。前者是日本一家侵华，后者是日俄为了东亚霸权大打出手，中国政府宣布局外中立，把国土让给日俄作为战场，其民族耻辱远胜甲午战争。那场战争的结局是俄国战败，将中国东北的殖民霸权让给日本。沙俄帝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了耻辱，直到1945年通过在最后一刻加入对日战争才报了一箭之仇。所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

中国人都知道鲁迅弃医从文，要改造国民性，一定程度上是深受日俄战争的刺激。但很少有人知道，日俄战争对少年周恩来也有强烈的刺激。周恩来当年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有一年没有回家度假，和一个姓何的同学去了他在奉天南郊的老家。何家的祖父是一个民族主义情怀强烈的老秀才，在家开私塾。他带着周恩来和自己的孙辈去看奉天附近日俄战争的旧址。日俄战争从旅顺打到奉天，沙俄战败，把一腔怒气发泄到中国人头上，滥杀无辜百姓，何家就被俄军杀了四个，伤了六个。

当周恩来看到矗立在魏家楼子沙河岸上的纪念碑纪念塔时非常愤怒，说：“张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们李家，杀了我们李家无辜的人不算，还要在我们李家竖碑立塔纪念，真是欺人太甚了！”他还唱起了当时在东北十分流行的歌曲《何日醒》：“俄败何喜？日胜何欣？吾党何日醒，吾党何日醒？”

日俄战争给中国人带来的耻辱，对少年周恩来的影响一直延续了下来。1955年苏联和中国商谈从旅顺撤军时，苏联提出要在旅顺建立纪念1945年苏军胜利纪念碑和苏军烈士墓地，还要建立日俄战争时在那里战死的俄军马卡洛夫中将纪念碑和其他阵亡者的方尖碑。旅顺两万多俄军（苏军）尸骸中，绝大部分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冤魂。周恩来同意了前两条，但拒绝了后两条。以当时中苏关系的亲密程度，周恩来的拒绝还是很需要一点勇气的。

周恩来对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耻辱不能忘怀，还表现在他对苏联小说《旅顺口》的态度上。1950年1月，周恩来赴苏谈判，由于火车要走10天，

他关照秘书带一些阅读材料。秘书带了这本1946年出版后得到斯大林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周恩来翻了一半就对秘书说这是一本坏书，作者站在沙皇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竭力美化和宣扬沙俄的侵华战争。他还说：“这样一本书，竟然得了斯大林文学奖。”在回程中，周恩来再度对这本书发表评论，说它“宣扬的是沙俄战争，掠夺战争那一套”，“竭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里面的中国人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实在令人气愤”。

当时“一边倒”是既定国策，这本小说很快被翻译成中文也不奇怪，周恩来作为领导人之一当然了解底细。但今天我们知道他私下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愤懑，尤其是在前往苏联和斯大林谈判中苏友好条约时，还一直念念不忘，至少可以说当年日俄战争的刺激还是对他处理中苏关系有一些影响。他对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民族耻辱和后来苏联对那场战争的态度所持的一贯立场，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应该有所启发。 （据《南方周末》）

周恩来甘当副手的家族基因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在研究周恩来时有个困惑，即为什么周恩来“一贯地帮助别人升到顶端，自己却拒绝这顶桂冠”？其实，这与周恩来的家族文化习染有不小的精神勾连。

周恩来家族属浙江绍兴宝佑桥周氏，清代就出过2位进士、5位举人。5位举人中有4位是周恩来的堂伯父或堂叔父。周氏家族的突出特点是外出当师爷的传统，推崇一种“温、良、恭、俭、让”的人文精神。在周恩来身上，我们不难看出家族前辈某些群体性格的影子，如谦恭有礼、勤恳谨慎、精明干练以及成人之美的胸怀等。周恩来的堂伯父周和鼎为人忠厚，“名不求高但近情”，以做幕僚为人生归宿。他1907年做江苏巡抚陈夔龙的总文案，1917年又到江苏督军李纯处当主任秘书。周和鼎的长孙周尔流说：“我祖父作为清末举人，在思想上、文化上乃至经济上给七伯（即周恩来）一定影响和支持，这都是肯定的。”

除家族传统，家庭生活对周恩来性格的影响也不可小视。他回忆说：“我出生后……把我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父周贻能长期奔波在外，周恩来是在浓厚的母教氛围中长大的。他回忆说：“母教的过分仁慈和礼让，对我的性格是有影响的，缺少那种野性。”

当然，尽管周恩来性格的基本特征偏于柔性和温情，但后来长期的政治生活又锤炼和丰富了他的性格结构。毛泽东曾以“虎气”和“猴气”自喻，而日本学者梨本佑平认为“鹰和鸽的极为不同的双重性格”潜伏在周恩来的体内。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刚中带柔，而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巨大功业的性格基础。 （据《中华传奇》）